

#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

陈云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

---

著 者/孙业礼 熊亮华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李法明

版面设计/郑 刚

---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排版车间

印 刷/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

850×1168mm 32 开 9.875 印张 25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

ISBN-7-5073-0323-3/K·110 定价:18.00 元

---

# 目 录

## 一、勒住“脱缰野马”，实现经济统一，让资本家佩服， 毛泽东称之曰“能” ..... (1)

未雨绸缪，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点将  
责无旁贷，组建中财委，九爷府元帅升帐  
查封证券大楼，平息银元风波，使人民币“进占”  
上海  
过家门不入，受中央委托，主持上海财经会议  
抓住“两白一黑”，打垮投机分子，稳定全国物价  
克服分散现象，一统财政经济  
得饶人处且饶人，发两路“救兵”，调整工商业

## 二、整顿财经队伍，消除“三反”、“五反”后遗症 ..... (52)

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采取迂回战术，向毛泽东反映“三反”中的问题  
消除“五反”后遗症，使资本家“难忘 1953 年”

## 三、高、饶联手向党发难，财经会议平地起风云；毛泽东急 令周恩来北戴河“搬兵”，请回陈云，平息风波 ... (70)

高、饶野心的膨胀  
高、饶抓住新税制问题，“批薄射刘”  
周恩来请来援兵，为薄一波“解围”

## 四、“黑色炸药”与“黄色炸药”之间的选择：实行粮食统购 统销 ..... (83)

1953 年的粮食形势：问题严重，办法不多，难以

为继

一担“炸药”，八种选择

上边“三定”，下边“四定”

## 五、主持对资改造，主张网开一面，使资本家“坐三望四得五”，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00)

提前进行的战役

网开一面，对资本家留牌子、给位子、发票子

资本主义的羊肉为什么社会主义以后不好吃了

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

锣鼓声后的思考

## 六、主持编制实施“一五”计划，强调稳中求胜，反对冒进，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115)

为“一五”计划呕心沥血，四年编制，五易其稿

总结经验，反对冒进

## 七、在“大跃进”运动的狂飙中…………… (129)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批评反冒进：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陈云不得不再三“检讨”反冒进的“错误”

计划节节拔高；陈云心怀疑虑，但没有说话

出席北戴河会议：避得了自然界的酷暑，躲不过人为的狂热

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肆虐。陈云苦口婆心：基本建设要配套前进，要讲质量、讲安全

开始纠“左”。陈云说出了对高指标和瞎指挥的疑虑。毛泽东夸奖：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钢铁指标是政治问题，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

庐山会议；观潮派原来是彭德怀；不同声音消失了。更大规模的冒进，使饥谨之魔得以肆虐于神州

## 八、一切为了渡过困难时期 ..... (190)

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绷断；面对危急形势，力主进口粮食

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寻找走出粮食困境的办法，陈云对发展化肥情有独钟

生产无以为继，调整不得不提上日程。纵览全局，主张动员两千万城镇人口下乡

农民牢骚满腹。陈云四下青浦农村调查，深感问题严重

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西楼会议一席发言，使经济调整进入正轨

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毅然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办法，却再次遭到严厉批评

## 九、“文革”后期复出，协助周恩来抓外贸 ..... (264)

在江西“蹲点”两年七个月后，回到北京

离用金子修厕所的时代还远，现在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当一回“洋奴”

利用资本主义的交易所，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 十、陈云与三中全会前后的调整与改革 ..... (278)

多年不鸣，一鸣惊人。两次关键时刻的发言，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同李先念联名上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必

须进行调整！邓小平和李先念请陈云再次出掌经济工作

宝钢勿促上马，进也难，退也难。陈云亲自调查，思之再三才拍板：干到底

陈云预言：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种经济的比例调整将占重要地位

# 勒住“脱缰野马”，实现经济统一，让资本家佩服，毛泽东称之曰“能”

未雨绸缪，毛泽东、周恩来西柏坡点将

1949年初，严冬尚未退尽，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却早已春意盎然。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相继告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力部队已基本上被歼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汇集西柏坡，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蓝图。

胜利来的似乎太匆忙了，领袖们不得不对一些过去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的问题迅速作出决策。不过，此时令领袖们费神的已不再是军事问题了。国民党仅存的100多万残兵败将分布在从新疆到海南的广阔地区，这对于久经考验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已经不成对手。令领袖们大伤脑筋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而来的严峻的经济形势。

尽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我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正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不堪。

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内战的需要，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

政赤字越来越大，为弥补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动员上海等地的印钞厂赶印纸币，仍不敷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国民党统治区 1947 年的法币发行量达 30 多万亿元，为 1946 年法币发行量的 10 倍，比 1945 年抗战结束时增加 25 倍。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如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到 1947 年 7 月就上涨 6 万倍。

1947 年 7 月 24 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材料，这个材料虽有嘲讽的性质，但很说明问题。材料说：法币 100 元可买的物品，1937 年为 2 头牛，1938 年为 1 头牛，1941 年为 1 口猪，1943 年为 1 只鸡，1945 年为 1 条鱼，1946 年为 1 只鸡蛋，1947 年则为 1/3 盒火柴了。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破坏、物价飞涨的同时，五百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延长，开支日益浩大，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上这些人，全国约有 900 万军政人员的生活需要我们党想办法安排，这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也就使得我们在财政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当时部队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从 1948 年开始，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名句，曾被反复背诵和引用，但此刻真正理解毛泽东心境的人恐怕并不很多。自古道：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可以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夺取全国政权，但要巩固这一政权，则必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



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艾奇逊的这些话，作为中国革命的起因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批驳，但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肯定也注意到了其中的某些道理，那就是经济问题、吃饭问题是每一个政府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的问题。

因此，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城市工作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看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真正要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经济，谈何容易。这里，领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人才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懂经济的却少得可怜。因此，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中共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肯定管不好经济。美国人也认为，中共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则说的更明确。上海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就曾说过：“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0分。”这些虽然都言过其实，有瞧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意思，但我们自身的状况也的确不容乐观。

长期的农村环境，使我们的官兵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

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尤其是进城以后。

电影《风雨下钟山》中曾有这样一个镜头：占领南京总统府后，许多战士把总统府的地毯割下来分成小块给自己做毯子用。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华北解放初期，这种现象就曾非常严重。如在接收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有许多干部、战士乱抢物资，乱砸机器。占领石家庄时虽有一些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跑到城里拿东西，有些干部、战士不但自己拿，还鼓励老百姓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大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华东都解放几个月了，一些城市仍然秩序混乱，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连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也不得不慨叹：最头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复经济。

类似的报告从全国各地不断飞往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领袖们开始迫切地感觉到当务之急必须首先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似乎比其他领袖更早、更具体。他更多的是从组阁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的。因为这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周恩来将作为新政府的总理，主持政府的工作。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明确指出：周恩来一定要参加政府的工作，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其实，在此之前，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开始设想将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总理工作的情况。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物色各种人选了。

当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还在为寻找一位经济帅才而挖空心思时，周恩来对这一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周恩来果断地向毛泽东提出：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周恩来向中央举荐陈云决非偶然，他对陈云的了解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就开始了。当时，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他出色的经营受到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这时，周恩来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的工人阶级出身，

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

后来，顾顺章叛变，陈云又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这期间，陈云的果断和干练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周恩来与陈云接触越来越多，对陈云的了解也更加深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被派往东北。东北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顺利地接管了东北各大城市，东北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到1948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这一时期，陈云善于理财的本领再次受到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恩来开始就全国财经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征询陈云的意见。1949年初，周恩来即派当时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就全国货币发行方面一些问题向陈云征询意见。可见，这时在周恩来的心目中，陈云作为将来内阁中经济工作主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了。

毛泽东认识陈云比周恩来要晚，但至少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对陈云已经有了较深的印象。遵义会议上，陈云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之一。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决定让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上海重新组建上海党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云是非常信任的。延安时期，特别是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时所表现出的经济才能，也肯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后来，陈云在东北财经工作中的表现，毛泽东更是特别欣赏。1948年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它批发给全党学习。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吸收了陈云的做法。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但赞同陈云关于接收城市的意见，还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的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

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正因如此，周恩来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方案已定，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几天之后，陈云一路风尘，赶赴西柏坡。

在西柏坡，陈云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作彻夜长谈。通过当面交换意见，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最后拍板。

### 责无旁贷，组建中财委，九爷府元帥升帳

西柏坡之行，非常短暂，但对陈云来说并不轻松。毛泽东和党中央把统帅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任交到他的肩上，显然是对他的信任，但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用句老话说，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陈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不过，从这一决策拍板的过程看，陈云似乎并未推辞甚至谦让。在西柏坡，陈云连来带去只呆了两天，确切地说是一天多一点。除去老战友之间的寒暄和汇报其他工作的时间，这一决策拍板的过程是非常短的，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这一方面说明陈云有服从党的分配的觉悟，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陈云的确是这一角色的不二人选，在他看来，这一工作责无旁贷。

对于经济工作，陈云有着一种特殊的兴趣和才能，这也许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

陈云出生在江苏青浦县的一小镇，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舅家开有一个小饭铺，由于人手不足，陈云自小便经常帮舅舅料理小饭铺的生意，耳濡目染，慢慢懂得了一些记帐的方法和经营技巧。

15岁左右，由于家境贫困，舅舅无法继续供陈云上学，后经人介绍，陈云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

代比较有名的企业，管理非常严格。在这里陈云学到了许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例如，他熟练的算盘技巧，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练就的。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有旧学渊源的人并不少，擅长书法的也大有人在，但懂得珠算，能熟练使用算盘的并不多，陈云却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那个计算机尚未发明的时代，懂得珠算，能熟练地使用算盘，在经营管理方面无疑是一大优势。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许多人都知道，建国初期，主持中财委工作时期，陈云同志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听见噼噼啪啪的算盘声，正是在这噼噼啪啪的算盘声中，一组组重要数据被核实，从而为一项项重大决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据说，后来赵朴初先生曾目睹陈云打算盘的镜头，惊叹之余，还曾赋诗一首。这是后话。不过，这说明，陈云在经营管理和财经方面的确有着过硬的基本功。

另外，旧中国虽然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旧时的上海却号称“十里洋场”。这里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较早、较大，很有现代城市的味道，经济运行中各种规律性的东西在这里表现的比较充分。陈云在学徒期间对这些东西接触较多，也有了较深的认识。这些都对陈云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70年代，陈云在谈到国际信贷问题时还指出：“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

陈云的这些经历，使他对经济工作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从此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前所述，在踏上革命征途之初，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时期，陈云即利用自己的特长，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进入苏区后，虽然他分管的是工会工作，但他仍从自

己的工作岗位出发，密切注视着苏区的经济工作。这一时期，他写的《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都是相当有见地的。尽管由于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不高，这些文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确是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延安时期，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建设上，兼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时间很短，但就在这极短时间内，他的经济才干也得到了充分显示。这一时期他提出的一些观点纠正了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对许多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1945年2月，他针对我们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做财经工作的几条基本原则：

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总之，在算帐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些原则也仍然是做财经工作的人所必须遵循的。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各大城市的接管非常顺利，经济恢复也比较快，这些都与陈云出色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早在

1948年8月，三大战役结束之前，陈云就提出：“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在那个时期就把财经工作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比较早的。可见，在经济问题上，陈云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时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决策的果断和陈云对待这项工作责无旁贷的态度。

党中央决定由陈云来做经济工作的主帅，的确是人尽其才。事隔几十年后，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仍然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已非常紧迫，陈云受命之后，甚至连即将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都未及参加，即匆忙折返东北，准备交接东北的工作，走马上任。

然而，东北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一时不可能交接完毕。东北解放较早，土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又靠近苏联，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都是极有利的条件。而且，当时，中央也已确定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方针，陈云也想在离开东北以前，尽量多了解一些东北的情况，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制定一个好的计划，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因此，利用这段时间，陈云几乎走遍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领导东北财委开始制定1950年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

这边，东北的工作，陈云一时无法脱手。但另一边，中央的经济工作却不能“一日无主”了。

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3月14日，周恩来在他为中央书记处

起草的《关于经济及后勤工作的决定》(草案)中再次指出：中央应立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

4月10日，中央致电东北局：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4月30日，周恩来又电示东北局，希望陈云及早动身进京。

5月3日，陈云致电中央：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5月10日前可到北平。

此后，中央又一次来电催促。

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陈云不得不迅速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5月7日，陈云电告中央：9日一定离沈阳赴北平。这样，5月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才正式免去了陈云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

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

陈云的一贯风格是谨慎、稳健，因此，进关之前，他并没有立下什么豪言壮语。当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时，他只是平淡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要看他平和的很，他看问题很尖锐。”陈云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在激烈地思考着如何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了。

陈云进关以后，组建中财委的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5月31日，刘少奇起草，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发出。《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大纲》要求：

(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



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二)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三)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了。

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会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这实际上是中财委成立前同各界打招呼的会议，会上，陈云对为什么要成立中财委、中财委的任务、中财委的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中财委正式成立。会上，陈云宣布，中财委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